

白银挽歌

BAIYINWANG

张冰◎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白银挽歌

张 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银挽歌 / 张冰著.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 - 7 - 207 - 09884 - 9

I. ①白… II. ①张… III. ①俄罗斯文学—文学评论—近代—文集 IV. ①I512.06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1408 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装帧设计: 臧 祥

白银挽歌

张 冰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 net
印 刷 哈尔滨久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9884 - 9
定 价 45.00 元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 东北网络台 (www. dbw. cn)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白银挽歌

自序

在《白银悲歌》(1998年11月,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之后,总觉得言有未尽——一方面,已经写到的题目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另一方面,这个时期俄国文化和文学中还有众多现象没有涉及到。可与此同时,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分心搞一些与学术无干的事务性工作,以此之故,更多的选题最终还是“胎死腹中”。每念及此,总不免戚戚然若有所失。乌呼,熊掌和鱼岂可兼得?!

这本书中所辑的文章,一共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早已写就,但写作之时,是为了另外一部书写的,如今情况变化,原拟出的书不出了,所以放在这里,对自己的一段生命历程,也算有个交待。二是在工作之余牺牲睡眠和休息写成的学术性随笔。文章本系小道,而随笔之属尤为小道之小者,通学大儒是不屑为之的。而我却对此类文体情有独衷,而且,我认为与正而八经的学术论文相比,随笔有其不可取代的优点,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在论文中不好说、不易说、说了即显得愚拙的东西,放在随笔里反而天衣无缝。反正是姑妄言之,读者中有会心者,一笑了之。谁也不会与你对簿公堂,反倒为你表述思想提供了一种便利。三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的正而八经的学术论文。学术论文与随笔应该有其严格的界线,但若就思想表述而言,则高头讲章是文章,嬉笑怒

骂也未尝不可，文体不同，但都是表述思想。放在这里，我想不至于那么不谐调吧？

又要采用“白银时代”这样一个触目的字眼总不免有些惴惴。据说有人对此词十分反感。可我这些年中，无论读什么书，都不离这一段时期，自然写起文章来，也不脱这个时期了。至于为什么不采用诸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样的说法，纯粹是因为这两个字比较简洁，用作书名不合适，决不是想要“附骥尾”、“攀名流”。

这，就是作为本书作者的我的交待。



目 录

乱世漂泊一诗魂	(1)
常恨言语浅 岂如人意深	(6)
阿赫玛托娃和她的创作	(13)
皇村最后一只天鹅	(21)
哭泣着寻找上帝的人	(29)
观剧圣彼得堡	(46)
一枝一叶总关情	(51)
心远地自偏	
——俄侨女作家苔菲的创作	(54)
阿赫玛托娃论作家的职业病	(58)
生活在别处	
——小议《无望的逃离》中的“逃离”	(60)
由偶像的碎片拼贴的思想	
——小议希什金《攻克伊兹梅尔》	(62)
以人的名义	
——小议弗拉基莫夫《将军和他的部队》	(65)
苔菲和她的创作	(68)
索洛维约夫思想中的“东方”与“西方”	(74)
作为文学家的别尔嘉耶夫	(78)
穿黑裙的路德	(80)

思穷天地有形外

——《莫斯科—佩图什基》读后 (89)

唯美王子库兹明 (97)

雏凤清于老凤声 (107)

舍斯托夫的哲学 (110)

阿赫玛托娃的诗人观 (112)

高尔基与安德烈耶夫 (118)

走近安德烈耶夫 (123)

走近普希金 (129)

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马步》阅读拾零 (132)

马步(选译) (141)

科克捷别利的隐士诗人 (145)

俄国象征派语言艺术大师索洛古勃和他的创作 (154)

20 世纪的巴拉廷斯基

——霍达谢维奇素描 (167)

俄国的奥尔菲士——安·别雷 (172)

壮志未酬的布尔加科夫 (177)

生非容易死非难

——弗·库·索洛古勃剪影 (182)

弗·谢·索洛维约夫生平及其哲学思想 (188)

此曲只应天上有 (196)

想入风云变态中

——兼评萨拉斯金娜新作《索尔仁尼琴评传》 (211)



乱世漂泊一诗魂

诗,并非只有分行押韵才算诗,散文,也可以具有诗意。说到底,诗的本意,应是指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角度或曰一种立场。一个人只要他是在“诗意地栖居着”,那么,在他眼中,大千世界,鸟兽虫鱼,无不焕发着无穷的诗意。总之,要写出好的诗,需要作者具备一双诗人用以观世的“眼睛”,这“眼睛”当如古希腊神话中那只能够“点石成金”的手,能在常人眼里的庸常之处,发掘出美和诗来。这是我在读泰菲(本名洛赫维茨卡娅)的《回忆录》时,感受最深的一点。泰菲的这本《回忆录》,写作和出版于20年代,那正是如今被我们“炒”得十分热闹的“白银时代”(1895—1930)。出版此书的是大名鼎鼎的“列夫”出版社,据我记忆,这个在勃里克资助下成立的出版社,存在到1927年。而我手头读的这本书,是法国巴黎“文艺复兴”出版社1980年据旧版重印本。应当感谢这家出版社,使得这本堪称精品的随笔,不致为历史的尘埃所湮没。

这本书之所以会令我“一见钟情”,盖因它那独特的韵味和风致,以及作者在书中似乎无处不在的那一颗“诗心”。我们已经有过太多的所谓“书”,人们从中看不到作者的“主体意识”何在。通篇只令人感到这不过是某某通过作者的嘴在宣讲。我们生活在一个“复印机”的时代而不自知,这是我们时代的大不幸。而这本书,不但语言,单从风格看,即足以使你断定,它只能出之于泰菲的手笔,而非任何同一时期中其他哪位作家之手——它带有泰菲独特的精神的印迹。

书中所记述的年代,恰好正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十月革命后最艰难的几年——1918—1920年。那是一个战火纷飞、鱼龙混杂的年代。作者以其过人的文笔,记述她如何为了逃离混乱的首都,乃至匆忙加入一个巡回演出团,在俄国外省漫游,途中经历艰险,饱经忧患,数度面临生死抉择,直至阴差阳错,被迫离开祖国逃亡的全过程。作者在此是否有为自己辩白之意,就不可贸然推断了。此时的泰菲,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对“诗国之王”巴尔蒙特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以其学生自许且自豪的初学写作者,而已是名闻遐迩的一位大作家了。据说,列宁本人一度还想延揽泰菲为布尔什维克报纸的主笔。在书中记述的那个年代中,泰菲的肖

像遍及全国,甚至被没有文化、不知泰菲何许人也的农妇,当作宗教殉难者挂在家里。当时,某地出产的一种面包,即被命名为“泰菲”牌。从此书中,我们也能看出,许多家隶属于不同党派的报纸,也都争相延聘泰菲为主笔。仅此,也足以证明,泰菲当时已足够有名了。

这本书之所以让我喜欢,端在于作者面对苦难、危险、痛苦和赤贫,仍不失其作为诗人的优雅、含蓄、幽默和苦笑的风度。初看起来,作者的文字似乎“无奇可言”,只是平实的叙事,但一路读下来,却每每遇到足以令你心解颐之处,由不得你不拍掌称快!其之所以能获得这样一种效果,端在于作者与其所叙述的人事之间,始终保持着一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审美距离。真所谓“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对于如泰菲这样一个作家来说,似乎不难理解,因为她不是一个政治家,只不过是喜欢舞文弄墨的“弱女子”;她也不是一名斗士,而只不过是位落荒而逃,一心只为求生而逃命的落魄文人。正因为如此,此书中的态度,真正达到了所谓“哀而不怒,怨而不伤”,含蓄蕴藉的诗人风致。

对这种“诗人风致”应历史地去理解。俄国十月革命后初年,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乱世”,这么说,并不是存心贬低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太阳并不因其同时也造成阴影而略失其伟大。但“乱世”云云,意在指明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真假难分,鱼目混珠。我们从书中记述的种种事实中,也不难验证这一点。

书中首先出现的,是一批贵妇群像。为了逃出革命中的俄国,她们把珠宝首饰或藏在衣着肮脏的村妇身上;或塞在手杖里,茶壶的夹层里,鼻子里,鸡蛋里;种种“奇遇”令人捧腹。可以想见,在这种场合下,泰菲自然是免不了要“幽它一默”的。针对把珠宝藏在鼻子里的贵妇,泰菲说道:一个人有一只价值 50 克拉的鼻子,那该会有多么幸福啊。在奥德萨,由于流亡者蜂拥而至,商品价格激涨以分钟计。售货员冲着一大块奶酪絮絮叨叨地抱怨。泰菲道:“那还不快把它包起来,那样它就不会涨价了。”再如,书中一情人对爱人说:“我像一个黑奴(拉勃)/将与你形影不离。”泰菲则调侃道:“我要像阴郁的癌症(拉克)/将与你形影不离。”

泰菲用字简洁到吝啬的地步,但往往能在寥寥几笔之间,栩栩如生地活画出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来,令你过目不忘。有的地方,几乎令你怀疑是否在读小说。对此,泰菲是这样解释的,她说:人们总以为是艺术在模仿生活,殊不知恰恰相反,是“生活在按照旧小说的模式在书写着自己”(p. 264)。泰菲是因为她所工作的《俄罗斯言论报》被封闭,一位著名演员在彼得堡朗诵泰菲的一篇小说而被捕感到恐慌,才匆匆忙忙踏上流亡之路的。在她参加的那个“草台班子”里,有一个差不多还是个小孩子的姑娘叫阿莉娅,极天真纯朴。流亡途中,因感于一家农妇对他们的热情款待,阿莉娅执意要种植一棵树后才走,否则便觉得对不起热情



好客的女主人。而阿莉娅的“两难处境”则更是令人捧腹：在罗斯托夫，有个沃娃，爱她爱得发狂；在基辅有个季马，爱她爱得要死。沃娃 18 岁，季马 19 岁。阿莉娅必须去罗斯托夫，可她又得嫁给基辅的季马。沃娃一切顺遂，生性快活；而季马却是个很不走运的倒霉蛋。阿莉娅爱沃娃，可又丢不掉季马，觉得自己在此时此刻丢下季马太不地道。于是跑去罗斯托夫与沃娃暗中结婚的阿莉娅，当着外人，却装出互不认识，生怕别人认出后告诉季马，而季马一旦经受不住会自杀！直到沃娃因染伤寒死去，阿莉娅才从两难处境中最后解脱。

如果泰菲的“幽默”仅仅停留在表层，那还算不上什么。问题在于泰菲的“幽默”，不是建立在单纯玩弄一下语言文字而已，而是来自于“居高临下”，“洞幽烛微”的观察力，尔后才诉诸于“入木三分”的文笔所致。幽默感来源于智慧，它是生活中的智者对愚昧的一种超然的态度所使然。在许多地方，作者采用“欲擒故纵”的笔法，正话反说，先把读者引往一个方向，临近未了，才笔锋一转，使人物性格的本质赫然显现在追光灯下，使人顿悟。这种例子在此书中可谓比比皆是。如以抓捕小偷为职业的那个所谓的“政委”，大张旗鼓地举办盗窃财物展，以宣扬他的赫赫战绩。结果不数日后，人们得知：那位“政委”因参与抢劫而被枪毙。在船上漂泊时，遇到的那位假绅士，即为一著例。这是泰菲最出色的人物素描之一。船未驶入风浪区时，此人大言不惭，说他对付风浪如何如何有经验，并告泰菲如何防止晕船。不想船入风浪区后，人人被颠簸得如风中芦苇，狂吐不止，泰菲躺在床上动都不敢动。此时却见那位绅士面无人色，跌跌撞撞闯入统舱，逢人便问“受保护者”泰菲在哪儿，此时泰菲就在他眼前，他也慌得认不出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连“北”也找不到了。当风浪平息后，又见到泰菲的这位绅士，吹嘘说刚才在风浪区时，他一直和船长站在甲板上观海景。读到此处，读者想必也会和泰菲一样，晒然一笑，而在心底原谅吹牛这一人所难免的缺点吧。

类似这样行文中充满张力的例子，在泰菲笔下，俯拾即是。由于作者是在毫无目的的漂泊途中，此类人或事也就分外地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泰菲这本回忆录当作一部人物素描来读。任何人，一旦读进书中，都会感到：作者自身的遭遇反倒退到背景中去了，倒是作者在辗转途中，先后遇到的一个个刚一出现便即消失的人物——有的甚至是永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的命运——被挪到了前台，令人读后感慨良多。

姑引几例。沃娃——阿莉娅与之秘密结婚时，他年方 19。他在司令部当大尉的传令官，经常出差，来往送信。某次出差途中遇到一条已奄奄一息的疯狗。那狗显然染有恶疾，势将倒毙。狗眼神极凄苦，似在企求怜悯。沃娃尽管知道当地正流行恶性伤寒，但还是忍不住抚摸了那条楚楚可怜的生病小生物，终于病倒在叶卡捷琳堡街头，被人送到医院后不数天即死。阿莉娅只来得及见他最后一

面，他临终仍念叨着阿莉娅的名字。

而这本书中的阿莉娅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侥幸之大幸才得以逃脱死神魔爪的人呢？在去往罗斯托夫的火车上，本来预订了卧铺的阿莉娅，其座位被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军官霸占了。不想就在当天夜里，列车与一列货车相撞，前头两节被撞得粉碎——其中包括那位军官。而如果阿莉娅不把座位让给那位军官的话，死的就会是她，而不是那位军官了。

也许，这本书中写得最出色的，倒是那些有名和无名的，性格奇特的各类反派人物？比如那位据说其亲人都被布尔什维克杀害，遂发誓要让布尔什维克血染坟头的白军上校。每抓一名布尔什维克，他都要坐在门口台阶上，啜着茶，悠闲地看着手下的士兵把他吊死，此人还曾亲手把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孩的眼睛活生生地剜下来，更曾把一个侦察员手脚捆住，往嘴和鼻子里填土，直到把人活生生地憋死。高尔察克是国内战争时期著名的白军将领，曾任沙皇的奥德萨省省长。当他兵败后坐船在里海逃跑时，一艘红军船逼近前来进行搜查。高尔察克断定在劫难逃，便把随身带的文件箱扔进大海，翻过船舷，开枪自杀，葬身鱼腹，为一个旧时代做了可悲，但却又不失其悲壮的殉葬品。

马蒙特·达尔斯基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和他的女友格的故事，也十分有趣。马蒙特一生行侠仗义，威名远扬，死得却轻如鸿毛，就好像命运之神在有意捉弄他一般。在一辆行进中的电车踏板上，他为了给一位老太太让地方，一不小心失手掉了下去，被当场轧死。数月之后，他生前的女友，漂亮而又迷人的格，被送上绞首架。格视死如归，浑无惧色。她从容地抽完最后一支烟，将烟头潇洒地一弹，然后自己伸手把绞索往脖子上一套。由此可见，一种偏执的信念会使人变得多么可怕，竟能视生死若等闲。

人的本质并非总是与他们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所戴的面具同一，否则的话，世上的事便会简单得多了。人的本质，常常不是表现在他们怎么说，说什么，而是表现在他们怎么做，做什么上。只有观察力敏锐的人，才能明察秋毫，看出狐狸屁股后面藏着的那条尾巴来。在某地，当地一个被人称作“罗伯斯庇尔”的人，热情前来迎接来自首都的“慰问团”。然而，热情和笑脸却无法掩盖此人身上所穿貂皮大衣后面一个常人未必会留意的血迹斑斑的弹孔。而如果说“罗伯斯庇尔”是乱世英雄的话，那就错了。殊不知就连这位“罗伯斯庇尔”，一听到当地另一位人称X的姑娘的名字，也会吓得屁滚尿流。革命前此人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革命后摇身一变成为当地政权中一位手操生杀大权的“恶煞”，常亲手处决人犯，无丝毫怜悯心，连手下的红军战士也为之胆寒、靛悚。

泰菲对这场战争，采取的是超然独立的立场。她似乎应属于中派——如果有话。她力求在两军对垒之中，寻找到一个文化人可以立足的净土。这种努力看



上去有点悲壮。例如，流亡途中参加《基辅思想报》编辑部，原以为原为该编辑部同仁的彼得留拉，会“刀下留情”的，不成想这位匪首的部队尚未开进城里，彼得留拉就下令取缔《基辅思想报》，遂使“无枝可栖”的泰菲，只得重新打起精神，继续其渺不知其所终的流亡。这次流亡的最后一站是在奥德萨上演的。颇有些文人幻想仿照彼得堡的“浪狗”，建立一个夜酒店，以为流亡文人聚会之所，泰菲甚至亲自为之起名，但是，这种设想注定只能是空想。

泰菲本来未必就想出国。可她乘坐的“亚·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号”，因船上多系白军家属，闻知最近的港口已为布尔什维克占领，不敢靠岸，遂只得继续流亡。而这一去，即与俄国成隔世之别了。

如今，人们已经不再单单只从流亡作家的政治态度着眼，来评价其成就了。况且，虽同系流亡，其间差别甚大，有自愿的，也有并非自愿的。如今，泰菲她人虽早已埋骨异乡，但她的书却重返故国，这，大概也是命运的安排吧！

（《风雨旅程》原序，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又载《俄罗斯文学》1999年第1期）

常恨言语浅 岂如人意深

巴赫金无疑是当今一大思想家,对他的研究,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曾经不止一次浸淫在巴赫金的世界里思索。一种感觉始终在我心头萦绕。巴赫金似乎始终未能道出他实际上最想说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说,他并未能彻底表达自己,而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空白。而如今吸引我的,就是这一神秘的空白。

思想诚然以语言为其媒介或表达工具,但思想能为语言所穷形尽相地予以彻底无遗地表达吗?

思与言、道与器,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

老子尝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道之本体,是不可以诉诸言说的。凡诉诸言说的论道之说,即已非道之本体(尽管也含有道之成分)。这样一来,道之本体与道之言说之间,便横亘着一成不变的距离,而这距离是形而上的,差不多是永恒的。禅宗所说:屎里觅道,是说屎里可能包含有道之成分,但屎非道也。所以,老子才会拒绝言说。直至在出关(按即出世)时,为把门的军官逼迫,才写下五千字,是为《道德经》。

传说虽系传说,但于理则一也。

那么,道是否会永远拒绝言说吗?

非也。

针对老子以上那句话,白居易有一首反诘诗,诗云——

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白乐天看来根本不知或是不管老子写《道德经》究竟是否是被人逼迫,而径说他是“自著”之,也就是说,是自己写下来的。乐天的质询似乎也不无道理:无论道之本体如何玄妙,要想向人传达、使人受其感染,还是得诉诸言说,尽管言说



(工具)不完善到无法穷形尽相也罢。

言说,是存在的证明。逃避言说,也就是逃避存在。我们就生活在言说中,言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在言说之中的我们真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所以,即使言说不完善,我们也只能利用有限的工具,来窥测无限的道体。

我们别无选择。

巴赫金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有所言说。但他生不逢时,在他开始有了言说欲时,一个言论自由、怪论迭出、蓬蓬勃勃的自由思想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风声越来越紧,舆论越来越带有杀伐之气。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能像他的前人那样畅所欲言、酣畅淋漓地表达自我了。不只是他一个,很多人都已有了同感:话,再不能像从前那样,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而是未曾出口,先得在嘴里转那么几转再出来。出口的话已经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而是模棱两可、游移不定,叫你猜不出究竟是什么意思,才算“说”好了。

岂止巴赫金一个人是这样!而巴赫金又算什么?号称俄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的俄国形式主义狂不狂?狂。在其极盛时代即20年代早期,据说俄国凡有港口的地方,便是奥波亚兹成员的栖息之地!可那又怎么样?曾几何时,不是连它的执牛耳者什克洛夫斯基,也写了“悔过书”——《一个科学错误的纪念碑》吗?当年,在大学校园里,巴赫金其实就和这帮人——艾亨鲍姆、波里瓦诺夫——几乎可以说就是同在一座屋檐下。可生性腼腆的巴赫金到了儿也鼓不起勇气向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来一个自报家门。终于失之交臂——怨谁?

列夫·托洛茨基狂不狂?狂!本名勃朗斯坦的这个人,真乃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与列宁这位比他更伟大的人,把个俄国搅了个天翻地覆。影响了20世纪整个人类生活的十月革命,可以说就是出自他和列宁两个人的大脑。到后来,人们只知世上有托洛茨基,却不知勃朗斯坦何许人也。而这个名字,原是关押他的监狱里一位狱卒的名字。托洛茨基不是不能说,而是太能说了。就其天性而言,他比别人更像一位作家,而不是革命家或行政领导人——尽管他在这些方面同样功绩辉煌。托洛茨基是历史上罕见的真才子、大才子。你想,一个人戎马倥偬之际、奔波忙碌之时,仍然能下笔千言、著作等身,这,绝非一个平庸之辈所能为。他去世后,光全集就有几十卷之多,其他未及在生前出版的著作、文章、文件及档案等,大约也相当于几十卷之数。被流放阿拉木图之时,光他的私人档案和文件就装了好几卡车。他一个人在国外长期领导组织松散的反派,其机关刊物——《反对派通讯》——实际上每期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文章,几乎都是他一个人的手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精力旺盛,演讲起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作起文来倚马可待、

为文不择地而出的大才子,不也被贝壳流放、被迫住口了吗?

要论狂,马·高尔基狂不狂?狂。革命前就已腾名世界文坛,拯救灾民和知识分子,稿费多得足以在家里供养一个连的食客,爱才如癖、爱才如命,被文坛各派人物视为“北斗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高尔基,迫于时势,也不得不而再、再而三地说假话、说违心话。面对革命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其他话语,都不得不噤声,都不得不住口,否则,批判的武器就有变为武器的批判的可能!谁敢说不!谁能说不!不是就连素来桀骜不驯的维·什克洛夫斯基也认错了吗?不是就连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这样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们,也被当作犯人押上了审判台。对他们的审判,以莫斯科大审判之名,向全世界公布。老布尔什维克们纷纷落马,当着全世界大惊失色人们的面,认罪、服法,可以说是脸面丢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桩。当年的赫赫威名、不朽业绩、千秋功业,谁还能想起?!

真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纷纷然,如“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震撼世界的革命领袖转眼成了阶下囚、人民公敌。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片寂静、寂静一片。

身患骨髓炎已成半残废的巴赫金在被流放之时,“狂飙突进”的思想解放运动早已沉寂、不复与闻了。

巴赫金把“说”的欲望深埋在心底,在潜心寻找着可以使他突破重围的突破口。

终于,一个历史人物跃入他的眼帘——拉伯雷。好一个披着教士外衣的思想家,他居然能亦庄亦谐、嬉笑怒骂地把粗俗当作武器,将官方文化的铁壁,愣是冲开了一道缺口,让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透进来。好一个聪明的拉伯雷,在他手中,什么东西都可以被他用作武器——尤其是人体的下半部——别人羞于启齿的东西,到他口中,都全无遮拦,一泄如注、浑无忌惮!于是,宛若铁壁铜墙一般的中世纪官方文化,在拉伯雷的轰击下,城堡坍塌了;天地易位了;生命——被禁锢的生命——从石缝中、从地底下,蓬勃怒放而出。于是,在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废墟之上,一个顶天立地的新人——文艺复兴时代的新人,带着理想、带着尊严,站立了起来——“举目天地外,无我这般人”!这人顶天立地站在那儿,哈哈大笑,掏出令男人骄傲的那玩意儿,一通猛浇。一泡尿,把中世纪如铁桶一般的意识形态冲了个落花流水。

拉伯雷——一个给了巴赫金以灵感的人物!

拉伯雷——一个给了巴赫金以口实的人物!



由拉伯雷,巴赫金思维的触角,向人类的更早期探去——于是,一个个洋溢着民主自由气息的时代,呈现在他的眼前,在启发着他的思维。他开始认识到:一个文化昌明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时代。相反,凡是反动的历史时期,总是伴随着思想的专制和言论的无声。

万马齐喑究可哀!

巴赫金想要冲破的,就是这“万马齐喑”的时代!

当然,在走向拉伯雷之前,巴赫金到的第一个驿站,是柏拉图——对话体的开先河者。对话所给巴赫金的启示,是“我”与“他者”的共在。“我”由于我的所在而必然有所局限,只有他者的存在,才能弥补我的不足。所以,要想求得真知,只有把他者当作真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才有可能。真理是对话性的。真理存在于“我”与“他者”之间的“黄金地带”。“我”的知觉剩余只有结合了他者的“知觉剩余”,才可以使得真理显现。

巴赫金到的第二个驿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使巴赫金感兴趣的,不是这位俄国思想家兼作家的宗教哲学思想——那是使列夫·舍斯托夫、尼·别尔嘉耶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罗扎诺夫、伊里因、布尔加科夫们感兴趣的题目。巴赫金感兴趣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复调性”、“双声话语”、“对话”及其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话语中,往往交织着他人的话语;常常是在同一句话里,可以听得出一个集体的声音,听得出整整一个合唱队的轰鸣声!这样一来,巴赫金尽管也以解剖语词为基点,但他却穿透语词,一下子带领我们进入了意识层面,使我们意识到:即使是使用同一个语词,但不同人赋予同一个语词以截然不同的语意,因此,话语从本质上说,一开始就是对话性的。

谓予不信,且看若干例证。

比方说“文化”这个词儿。在高尔基心目中,所谓文化及所谓的“有文化”,在于人的内在修养、历史传承、古典教育等等。但在30年代初的苏联,为了千方百计笼络高尔基为自己张目,官方对文化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把许多城市其中包括高尔基的家乡——下诺夫戈罗德——都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高尔基“逃名”如逃命。且看巴拉诺夫所著《高尔基传》一书的评述:“中央文化和休息公园要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多么费解、多么难读的词组!是什么意思呢?中央文化和休息公园……多么荒谬呀!索利列尼基公园,很明白。海德公园,1907年他在那儿散过步,也很清楚。可为什么‘文化’必须‘落巢’于公园,好像到保护区一

样,难道在家里和电车上可以没有文化吗?”^①

他如——“与自然斗争”这一口号。在高尔基来说,“与自然斗争意味着:征服被太阳烤焦的沙漠,战胜干旱,清除杂草,消灭蚊虫、蟑螂等各种害虫,以及消灭传播鼠疫一类可怕传染病的鼠类动物,尽可能掌握预报地震和各种自然灾害并防止它们蔓延……”^②而在时人的心目中,“与自然斗争”却意味着“向自然索取——是我们的任务!”

诸如此类的“误解”,在30年代高尔基最后一次回到苏联后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比比皆是。按高尔基的社会构想,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生存;“主要的问题是:要把人渴望自由的愿望与纪律结合起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样一种社会理想。总之,人要向高飞向前进。而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却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可以“飞碎木片”!

于是,悲剧不可避免!

高尔基的困境,也是巴赫金的困境!

在巴赫金时代,官方话语已经确立了其大一统天下。

这个时代已经大不同于此前的八国四方、五音杂鸣、多声话语、嘈嘈嚷嚷、纷纷扬扬的那个白银时代了。

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个本来有望取代马雅科夫斯基去世后所留下的空白的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只因在会上大谈特谈天才、作家的职业素养,又因为被布哈林这个某人眼中的宿敌大力表彰了一通的缘故,而被贬入冷宫。

天才——这不是突出个人是什么?时代的主人是集体。何来的个人?!

但也不尽其然。

巴赫金的理论,建基于话语之上。话语,是把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在话语中,我们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话语中,我们成其为人。巴赫金理论中的所有核心概念,都以话语为中心、通过话语、借助于话语而构成。对话、复调、双声话语、多语共存、狂欢化……都是话语的表现形式。巴赫金的狂欢化乌托邦,是一个人人都当家作主、人人都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现实生活中的等级秩序不复存在了;世界的内外在界限消失了;把台上台下隔开的那道无形的墙不存在了;

^① 巴拉诺夫:《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② 同上,第218页。